

百年回忆容子自传（十）₂

席，但我们的理想还会继续。‘星火’即便停刊，我们还会在印华文化战线上发挥光和热。……”原来玉冰兄的中药店家庭开销大，且弟妹皆已长大，要求独自发展，不得不转让一个输出入商，玉冰兄受聘担任经理。

玉冰兄勉强一笑，说：“关于我的店，与其支撑一个空架子，忧心忡忡过日子，还不如试走另一条路，也许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座谈会上一片沉默之后，又响起：

“‘星火’就此结束？”

“不然，怎么办？”

这时，王奕廉兄的目光移到我身上，他要我谈谈进报馆的感想。

我望了望大家，嚅嗫地说：“进报馆工作是我从小的夙愿，完全没有料到竟然现实了。我不会忘记泗水‘大公商报’给了我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的学，好好的做；但是我更不会忘记泗水‘新群社’的学习小组，一路走来我有机会陪伴大伙热火朝天搞‘简报’、‘星火月刊’，是大伙帮我，像兄弟般的帮我，我才有今天、今天，即便走到天涯海角，即便多少久、多少岁月，我会想着你们每一个、每一个……”激流汹涌，泪花让我说不下去了。

“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玉冰兄对我是又安慰又鼓励。

《星火月刊》出版了两年（1953—1955），停刊了。

停刊前夜，我们“

星火”伙伴在一间餐厅里，又相聚了一次。来了7位：李文熊、王奕廉、王文华、黄勤力、蒋福才、杨群英（女）和我。席间有的喝啤酒有的喝汽水，不言停刊事，却把伤感脸上露，不言别离情，却把骊歌心上唱。黄勤力举着酒杯说：我们六人是六根不净，以后要好好修炼，好好做人，改邪归正。”

“勤力，你又在胡说什么，改邪是你，我们出席的六人，是六弦琴，永远协作弹出动人曲子。”

“不出狂言，就不是黄勤力。”

真的，黄勤力的狂言又来了：“我来安排，玉冰是个才子，不出几年就是商业巨子，群英和他必须马上结婚。男人一旦有钱就变坏，没听说过？”

杨群英脸红起来。

玉冰兄为了转移话题，故意说：“勤力，听说你最喜欢鲁迅的作品？”

“吹牛吧，鲁迅的杂文，勤力能理解？”果然，大家的目标转移了。

“我没有说过能理解鲁迅。鲁迅的杂文很难读。”黄勤力够聪明，话锋一转，他又占了上峰：“我最喜欢徐志摩的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的诗风靡了几代人，可惜他死得太早。”

“是陆小曼花费无度，害他不得不多兼课，飞机回来两地跑，机毁而人亡。”

“希望我们的群英姐不是陆小曼。”

“我们的群英姐绝不是徐志摩的陆小曼。不但不会花费无度，连花钱都不会。哈哈！”黄勤力兄有几分酒意，说话尽是调皮。

杨群英毕竟恋爱中，容易脸红。

到餐厅的招待员前来收拾残杯，我们走出餐厅，谁也没有理会凄风吹，只管互相拥抱，泪别！

泗水《大公商报》（1953—1960年代）

（一） 报界闻人张实中 提携后辈不放松

尽管我在泗水《大公商报》工作过七八年，但对它前期的那一段报史，还真有点模糊。后来拜读了已回到故国的吴序良和傅子任两位先生合写的“泗水《大公商报》简史”，才有进一步的认识：泗水《大公商报》原来是1922年由泗水福建同侨创办的《大公日报》和泗水中华总商会创办的《商报》两家华文报合并而成的一份报纸。当时的社长是叶世昌，主编林少琴，后由张实中接任为主编。《大公商报》除报导当地商情和国际金融商业动态外，也报导家乡消息。政治上立场持重。抗日战争爆发后，坚持爱国抗日大团结，反对妥协。因积极宣传抗日，曾多次



遭荷印殖民当局警告和勒令停刊。《大公商报》在印尼东区宣传华侨爱国团结，支援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1942年3月，日寇南侵占领了印尼，暂时停刊。日本投降后，《大公商报》复刊。

直到1953年5月间，经理林华珍自动辞职，副刊编辑林文轩回国，编辑黄克敏也离开报社。在这种情形之下，老社长叶世昌、总编辑张实中，深感报社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向泗水侨联领导提出要求援助，并要求选派得力人员来充实和加强报社的领导力量。而当我进《大公商报》工作，已经是在报馆董事部改组并聘请吴序良先生担任总经理以后的事情了。

吴序良先生是一

位实干华社文化工作者，年纪只四十多，已在华社有着良好的口碑和社会关系。他瘦瘦的体格，白皙的肤色，配上一付斯文眼镜，任谁一旦和他眼镜底下的眼光接触，他那种敏锐和坚定，他那种威而不严，会使你感到他是信得过言行一致的领导者。我在吴先生掌舵的报馆工作，与之相处越久，就越感受到他人格的魅力，表里一个样，有风险不推给别人，遇困难走在前面。吴先生走马上任，在两位得力副经理傅子任先生和倪政全先生协助下，人材精选，逐步改革，先整顿经理部，然后回过头来协助编辑部。我们编辑部成立一个“编辑小组”，由正副组长吴金盾和陈完璧领导，协助